

何启治

书林守望丛书

美丽的选择

何启治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丛书得到韬奋基金会资金资助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何启治

书林守望丛书

美丽的选择

何启治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选择/何启治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书林守望丛书/吴道弘主编)

ISBN 978-7-5656-0247-4

I. ①美… II. ①何… III. ①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3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043 号

书林守望丛书

MEILI DE XUANZE

美丽的选择

何启治 著

项目统筹:张 巍

责任编辑:陈 曦

责任设计:张 朋

责任校对:李佳艺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2 千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书林守望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 问 于友先 王万良 卢玉忆 冯俊科 伍 杰
刘 杲 徐柏容 巢 峰

编委会主任 吴道弘

编委会副主任 郑一奇(常务) 杨生平 杨学军 陈 鹏
陈芳烈 胡 越 韩方海

编 委 王维玲 方厚枢 邓中和 何启治 宋应离
邵益文 林君雄 周 奇 胡德培 赵 洛
俞 斌 聂震宁 钱锦衡 曹培章 熊国祯

做文化的守望者

——《书林守望丛书》总序

柳斌

文化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而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承载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出版人，不仅是出版活动的实践者，而且是人类文化创造、积累、交流、传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民族精神的护卫者和时代精神的弘扬者。任何时代，治书修史者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在我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受名利诱导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出版界跟风炒作、追求市场效应一夜成名而不顾文化品位等现象时有耳闻。在种种浮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出版从业者文化品格的缺失。唯其如此，为繁荣学术和民族文化而坚守文化天职、恪守社会责任的职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尤其值得在出版界大力弘扬。

001

出版人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具有坚守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一个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它的出版事业。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一脉不绝，就在于中国历代政治家、著作家、出版家、藏书家接续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尊崇历史、珍惜古籍、编修文献、善待图书、重视典藏的优良传统，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历代出版物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之后世，肩负起了将一个时代的科学文化及思想智慧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时俱丰、愈加巩固。作为新时期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的主体，当代出版工作者更加需要继承传统、关注时代，一方面自觉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整理、

批判、传承的责任，保持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以及同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文化自信力方面作出贡献，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更加坚韧。

出版人是文化创新的推动者，具有坚守文化本性的特殊责任。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基本业态，出版既有产业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必须通过创新来保持文化的独特品质和内容的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出版工作者的不竭动力和显著特征，不仅是文化积累和产品制造的组织者，而且也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和把关者，当然应当是新知识领域的开拓者和新成果的发现者、催生者。一方面，知识的保存、生产和应用，文化和技术的传承、生产和原创，都是以出版活动为基础的。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从造纸术、印刷术到当代激光照排系统、计算机王码汉字处理系统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版人率先将新成果引进出版业，引发出版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版人通过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把握时代需要，促进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而现代出版史上鲁迅发现大批文学青年、叶圣陶对巴金处女作的慧眼识珠、巴金对曹禺作品的琢磨为玉的佳话，也反映了出版人所必备的发现新人新作的创新品质。在当前的创新型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已然成为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迫切需要出版工作者发现、认识、扶持、推广，进而铺垫中华民族元气深厚的文化创新的阶石，培育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神韵独具的文化创新的活力。

出版人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具有坚守文化领土与文化阵地的社会责任。出版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文化、创造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且还在于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作出评价，通过选择、把关实现对社会风气、学术思潮、文化倾向的引导。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竹帛长存”所构成的社会认知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才唤起了“见贤而思齐”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中心凝聚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出版传播活动，将“科学”与“民主”汇聚成了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内背景下，承担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传播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其选择、把关进而引导大众的责任更加重大，需要通过对精神生产加以规划与组织，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别与加工，对文化遗产作出选择和整理，对社会信息予以筛选和传递，打造传承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不断巩固主流文化阵地。这就要求当代出版工作者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不随波逐流，不跟风炒作，不断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引导大众文化、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历史已经证明，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便失去了发展的根基。而出版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素养、文化责任、文化运作能力和学术品评能力，又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文化的坚守，不仅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项出版实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能否坚持文化本位，能否坚守文化责任，对新时期的出版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书林守望丛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新中国出版人的精神文化启示录。其中反映出的经过沉淀而彰显的文化品格，尤其应该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支柱。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一群深深地钟情于出版事业的文化守望者，他们在“书荒”时代辛勤耕耘，在“书海”时代坚持方向，恪守文化的尊严，组织、规划、策划、编辑、出版过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及具有学术价值、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工程，主持、主编过一大批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等方面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知识读物，为全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勇于开拓、后启来者的创新精神和坚守精神家园、淡泊名利的文化风骨，堪称典范。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者形成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产生更多让世界为之惊喜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再现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气魄。

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要在

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能开阔视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创造、包容多样的新型复合型出版人才，来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2009年7月

美丽的选择

——回眸文学编辑四十秋(代自序)

广受注目的“卖饭记”

从1992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的《深圳特区报》、《新闻出版报》、《光明日报》、《大连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漓江》、《芳草》、《芙蓉》、《新华文摘》等杂志，以及海峡对岸台北的《中央日报》等近二十家新闻出版单位分别以《卖饭生涯——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的唐教授》、《中国教授在纽约》等大同小异的题目，或选载或连载，或全文刊登一部讲述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故事的纪实文学作品，而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则主动向作者组稿，将它结集出版。

001

《中国教授闯纽约》，这部从大江南北到海峡对岸持续数年颇受关注的纪实文学作品，就是我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并一度到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的文字收获。作品中的“唐教授”就是我，故事中写到的一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见闻和思考。

知道我要去美国探亲，作家柯云路对我说：“老何，你去美国探亲，机会难得，我不想劝你写什么东西，倒是希望你留心观察那里的生活——任何新鲜的生活对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笔财富。”而另一位在1989年6月14日亲自送我到首都机场的好朋友、颇具声望的中年评论家冯立三却对我说：“启治，你自费去一趟美国不容易。我劝你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而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美国，回来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

一个劝我不一定写，一个劝我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但他们的意



1960年，河北丰润县的田野上。

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时艰。（左起第一人为何启治）

002

见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让我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一下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超级大国。

这也符合我的心愿——有人说美国的月亮最亮最圆，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自己的月亮才又亮又圆；那么我们何妨改变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从彼此月亮的阴晴圆缺中，取长补短而不断地完善自己呢？我想，作为还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去观察体验生活，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决非人云亦云的印象。

也许，正是这些主客观原因，使得《中国教授闯纽约》不但具有题材的新鲜感，而且能够“真实地、丰富地（既有中心场景又有其辐射圈），有吸引力地展示了纽约华人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情景……”（冯立三）较之许多浮泛的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它也“更具有个性……纪实，达到了逼真的程度；叙述，达到了生动形象的文学层面”（李炳银）。

除了这部给作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双效益”的《中国教授闯纽约》，十多年前，我还曾以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获

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以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合作，载《当代》1981年第5期)获得1981年~1982年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人到中年，又经历过十年浩劫，能有如此创作成果，似可聊以自慰了吧。但在我看来，在我回眸往昔的时候，我想说，就创作而论，我只是一个在碰到机会时不敢偷懒的业余作者罢了；如果说自豪，那我只能因为我终身的职业编辑生涯感到自豪，它使我同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不期而遇。

《古船》、《大国之魂》、《白鹿原》

我是广东龙川县人，1936年9月生于香港。关于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旋即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1999年退休，又同时返聘到2003年，才完全离开工作岗位。

择要而言，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过校对、编辑及《当代》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副主任兼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1992年起为主管人文社

003



1960年1月何启治、叶冰如(1936~2002年)夫妻摄于北京

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期间，先后担任过《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中直工作委员会委员。1982年参加中国作协，1989年被评为编审。退休后仍任《当代》杂志顾问，人文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系终身职业编辑。

四十多年来，我除了本职的编辑工作，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有点奇特的经历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1960年），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的故乡搞文化调查（1964年），到上海原荣氏某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当“临时工”（1964年），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最年轻的团员（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士”（1966年）；1974年至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我在青海格尔木和拉萨等地工作过，还曾不甘寂寞地筹办并主编过西藏格尔木中学的文学性校刊《红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又一次接受鲁迅精神的熏陶，感受鲁迅的博大精深；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和华人衣厂有过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等等。然而，几十年来，我的青春和生命主要还是耗费在中国当代文学方面。我曾经和自己的同事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一般地说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才，但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在当代文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就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我这么想，也是尽心尽力地这么做的。

1986年五六月间，年轻的张炜带着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到北京来找《当代》。这时，我刚刚担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第一次受主编的委托负责终审长篇小说。

《古船》描述的故事是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回溯到40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年代。这深沉厚重悲壮动人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感慨良多。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场景。我读后认定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些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当即决定在《当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发经张炜略加修订的《古船》。

《古船》在当时还有二十多万发行量的《当代》发表后，果然引起强烈



1959年8月何启治(后排左2)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念。

前排左起：妹妹何桂芳、母亲刘惠珍、大嫂陈婉雯；后排左起：
弟弟何启庆、大哥何启光、四哥何启源。

的反响。

005

然而不久，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古船》受到了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而我也不得不据理力争，坚持自己对《古船》的基本评价，强调要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使《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由人文社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当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来自领导的批评意见时，对自己经手的稿件能够排除私心杂念，采取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编辑良好的职业道德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现。

《大国之魂》，是我1990年6月从美国探亲回来后面面对的第一部比较复杂的书稿。

其时，我刚刚成为主持《当代》日常编务的常务副主编。经过调查研



何启治作品书影(部分)

究，我首先排除了题材重复、美化美国等似是而非的问题。我强调要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看待四川青年作家邓贤辛苦经营数年、反复修改多次的这部《大国之魂》。我通过具体的分析后指出：在滇缅印战场与日寇周旋的确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作品着意通过二战中滇缅印战区的故事来透视中日英美等大国的民族之魂，无论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的优劣，或西方盟友和日本侵略者的长短，都作了严肃冷峻的剖析和充满激情又真实准确的表现，角度独特，发人深省，无疑是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有分量有魅力的好作品。

针对作品的现状，我提出删去一些枝蔓，特别是全部删去作者家世（其父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运输兵，其母是蒋纬国的妻侄女）这些部分，但一定要保留第一次在我国战争历史文学中披露的日本军队组织随军慰安妇的内容（约两万字），从而可以在全稿三十一万字中选用最精彩也是相对完整的部分（约二十万字）刊发于《当代》1990年第6期。后来香港、台湾出版的《大国之魂》，所用的便是精粹凝练的“《当代》版”。三十一万字的全稿则于1990年10月由人文社出版。

《大国之魂》一鸣惊人，邓贤也一跃成为四川较有影响的、备受海内

外瞩目的青年作家。

1992年早春,我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血之作——长篇小说《白鹿原》。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读完陈忠实这部长篇小说之后,虽然有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但总体上一致肯定《白鹿原》是一部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可读性,既有突破旧观念的认识价值,又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

我先签署了分两期(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在《当代》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又在1992年9月调任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后,签署了作为重点书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这样,这部描写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色彩斑斓、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我就这样成了《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也是它的责任编辑之一。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白鹿原》自1993年6月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以来,总印数早已超过百万册(含初版本、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系和精装本等),而其盗印本不下十种,其印数与正版接近。如此看来,说《白鹿原》的总印数在两百万册以上,当不为过。

然而,如此为读者酷爱的《白鹿原》面世以后,在好评如潮之外,确实还有另一种声音。除了学术争鸣之类的意见尚属正常以外,《白鹿原》确实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一方面是没有正式的批评意见,连电话通知我也没有接到,书照样印,可就是不让宣传,好像允许出书就是天大的恩赐似的。这就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让人深感压抑而又无奈;另一方面是,虽然《白鹿原》诞生以来,先后获得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第二届“双五”最佳文学奖和“炎黄杯”人民文学奖,但它在具有官方色彩的各类评奖(如“国家图书奖”)活动中均告落选,而在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的评奖活动中,它连候选的资格都

被主持会议的临时负责人粗暴地勾销了。

我对《白鹿原》所受的不公平对待深感不满。

1996年11月，我写了《从〈古船〉到〈白鹿原〉》（载《漓江》1997年第1期）一文，在《永远的〈白鹿原〉》这一专节中，我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评论家蔡葵、何镇邦看到文章后主动打电话来表示赞赏。老蔡说，现在这样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为好作品呐喊的文章太少了。

后来，《白鹿原》几经周折终于在1997年底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榜上有名。我备受鼓舞，立即撰写《欣喜·理解·企盼》一文，表示由衷的祝贺，对《白鹿原》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也表示了相当的理解。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在无锡组织了一次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请与会嘉宾举出二十年来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并略述理由，作为对新时期以来优秀出版物的肯定与回顾。当主持人李潘把话筒交到我手里时，我很自信地说：“作为一个老文学编辑：二十年来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就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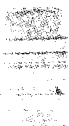
008

除了《永远的〈白鹿原〉》，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和它的作者，我还写了《〈白鹿原〉档案》、《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等近十篇文章，累计有好几万字，都是毫不犹豫、理直气壮的肯定与赞美。这在我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完全是自觉自愿去做的。

在《古船》、《大国之魂》和《白鹿原》这三部重要作品的编辑经历之外，还有两件往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阿来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开头并没有被《当代》某些看过此作的编辑所看好。我后来意外看到这部小说之后，作为主编立即决定选载此作的一部分于《当代》1998年第2期，并为此撰写了对《尘埃落定》备加赞赏的“编者按”。

其二，是由于我的支持和推荐而在《当代》和人文社连续发表、出版作品的柳建伟，于1998年至2001年2月终于又完成了一部规模宏大、以西部某省会为中心舞台，在经济建设的矛盾纠葛中抒写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这部长篇由于高唱主旋律又被某些同事所不认同。但我认为只要坚守文学的本分，唱响主旋律不一定就不好。何况此作歌



颂了各种各样的时代英雄，包括来自底层的平民英雄，而且又是柳建伟心血之作《时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北方城郭》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重围》，都获得较高的评价。）我们应该将《三部曲》完整地推出。虽然当时我已退休，但我的意见还是说服了其他同仁。《英雄时代》于2001年3月出版后，我应约撰写了《谱写时代的英雄乐章》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而柳建伟则在送给我的样书上热情地题写了这样的话：“恩师何启治先生存念 经您培育的《时代三部曲》出齐，愿与您共享这一阶段性成果……”下署：“学生柳建伟敬呈2001年4月成都”。

2005年4月11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评出，《英雄时代》榜上有名。这时候，一位同事回忆说，当年何老师就说过，《英雄时代》不但该出，说不定还会得个茅盾文学奖呢！可见，一个有眼光、有主见的编辑，该坚持时就得坚持，可不能人云亦云啊！

此外，在新时期、在当代文学的编辑岗位上，我还为一些重要作品或文学新人有艺术个性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衰与荣》（柯云路），《大上海沉没》（俞天白），《女巫》（竹林），《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商界》（钱石昌、欧伟雄），《秦牧全集》，《陈国凯选集》，《赤彤丹珠》（张抗抗），《文学评论家丛书》（陈荒煤、冯牧主编，共十六种），《惑之年》（母碧芳），《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雅文），《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周梅森），《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我是太阳》（邓一光），《霹雳三年》（王火），《牵手》（王海鸽），《歇马山庄》（孙惠芬），《狂欢的季节》（王蒙），等等。当了几十年文学编辑，成果不过如此，但毕竟是尽心尽力地为作家服务过，还是可以聊以自慰吧。

009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

回顾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难忘在人生的长途中有过两次面临重要的抉择。

头一次，是在“五七”干校的后期（1972年），广西一些大学到湖北咸宁去挑选老师。我可以选择去大学教书，却终于还是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3年夏天回到人文社的小说北组当编辑。这是从教还是从文